



目前，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200多名，全国有3000多名。

突然有一天，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：“高医生，我儿子今天不好，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。”高晓刚过去一看，真不行了，马上启动捐献程序，进行脑死亡状态的判定。签字早就签完了，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。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，妈妈受不了了……

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，但当记者提问时，案例一下子涌上来太多了，告别的画面，尤其记得清楚。高晓刚说：“我是一名医生，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，但看到这些画面，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，也受不了。”

大多数时候，高晓刚会回避和孩子家长去谈。“前期我会告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，会协调好力量陪护他们，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候，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，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，没有什

么技巧，就是陪着哭，陪着宣泄情绪。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，他们还是希望，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。”

采访进行到这里，高晓刚沉默了足足三分钟……

他的拒绝是正常的，他的同意是伟大的

做协调员多年，高晓刚通常会回避“一定要谈成”这种理念。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，必须坦诚，才能彼此信任。

“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，任何一个患者家属，他的拒绝都是正常的，他的同意是伟大的，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。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，哪怕他们现在不同意，以后可能会转变。”事实上，



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曾经有一位大姐，打电话到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，但医院不做遗体捐献，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及团队。了解过后，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。但过了好久，她一个姐妹的老公，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，人救不过来了。她就打电话来说，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？

这就是“熟人社会”的效应，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推广，如果熟人接受了，捐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，甚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。比如说，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，家里有两个儿子，很内向，每天在家打游戏，职业上没有出路——高晓刚知道后，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，比如，怎么答辩，怎么讲话，怎么应聘，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，工作找到了，女朋友也有了，生活很幸福。

2021年，“协调员”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变化——正式转为了红十字会志愿者，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，这样一来，认可度就变化了，协调员不是劝捐，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，提供养老、上学、福利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。

目前，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服务队的协调员共有200多名，全国有3000多名。高晓刚认为，器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，需要在象牙塔里普及。“2017年我第一次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，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，我讲到，人这一生，应该看得远一点，就像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一样，人的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



左图：高晓刚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做人体器官捐献演讲。